

民族·文化·传播系列丛书

IMPACT ADAPTATION AND RECONSTRUCTION

冲击·适应·重塑

——网络与少数民族文化

岳广鹏 著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China Minzu University Press

冲击·适应·重塑

——网络与少数民族文化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China Minzu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冲击·适应·重塑：网络与少数民族文化/岳广鹏著.
—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10.11
ISBN 978-7-81108-932-5

I. ①冲… II. ①岳… III. ①计算机网络—影响—少数民族—民族文化—研究—中国 IV. ①K28-3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197454 号

冲击·适应·重塑

作 者	岳广鹏
责任编辑	白立元
封面设计	吴 海
出 版 者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 27 号 邮编:100081 电话:68472815(发行部) 传真:68932751(发行部) 68932218(总编室) 68932447(办公室)
发 行 者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者	北京宏伟双华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1092(毫米) 1/16 印张:21.25
字 数	340 千字
版 次	2010 年 11 月第 1 版 2010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1108-932-5
定 价	48.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目 录

寻找传播学的“想象力”(代前言)	(1)
------------------	-----

第一部分 文化即传播

第一章 社会的“精神外壳”	(15)
一、文化的定义	(15)
二、文化的结构	(20)
三、文化的特征	(24)
第二章 社会的“神经系统”	(29)
一、传播的定义	(29)
二、传播媒介与社会	(32)
三、社会的“神经”病	(43)
第三章 文化即传播	(45)
一、传播是文化的“脚”	(46)
二、文化的传播	(52)
三、传播的文化	(58)

第二部分 相 遇

第四章 鲜花盛开的历史后院	(65)
一、少数民族文化的特征	(66)
二、文化传承——民族内部纵向的文化传播	(68)
三、扩散——民族间横向的文化传播	(71)
四、文化扩散的规律	(77)
第五章 网络的“经络图”	(82)
一、后视镜中的网络	(82)

二、网络的素描肖像	(88)
三、网络的经络	(94)
第六章 倾斜的网络	(105)
一、不平的网络	(105)
二、在网络中落伍	(111)

第三部分 冲击

第七章 众人的权力	(123)
一、网络文化	(123)
二、众人的权力	(132)
三、龙种与跳蚤	(140)
第八章 陌生人之间的游戏	(145)
一、交往方式	(146)
二、网络族	(155)
三、与陌生人游戏	(163)
四、游戏的困境	(171)
第九章 网络社会的崛起	(177)
一、加速人的社会化	(178)
二、权力的转移	(187)
三、人类智慧	(196)
四、真实虚拟文化	(212)

第四部分 适应与重塑

第十章 病痛的最严重症状	(219)
一、“加速器”	(220)
二、病因	(225)
三、症状	(232)
四、处方	(244)
第十一章 文化的遗传与变异	(253)
一、文化的遗传	(254)
二、遗传密码	(265)

目 录

三、遗传紊乱	(270)
四、引导变异	(275)
第十二章 砂轮与万花筒	(280)
一、文化的“平衡器”	(281)
二、文化的砂轮	(285)
三、文化的万花筒	(292)
四、文化的涅槃	(297)
悖论 人类的新玩具	(309)
后记	(329)

寻找传播学的“想象力”

（代前言）

将一个学科和“想象力”联系起来，并不是笔者的原创，灵感来自美国社会学家赖特·米尔斯的《社会学的想象力》一书。康德在其著作《纯粹理性批判》和《实用人类学》中对“想象力”概念做了详细的阐述。康德把这个概念的基本含义规定为人的一种直观能力，它能够表象即使不在场的对象，并依其是否具有创造性而划分为两种：一是“创制性的想象力”^①；二是“复制性的想象力”^②。很显然，赖特·米尔斯的“想象力”属于第一种，而笔者的“想象力”属于第二种。

—

《社会学的想象力》出版于1959年，是美国著名的批判社会学家赖特·米尔斯一生学术精华的大成之作。

所谓“社会学的想象力”，是社会科学研究者必须具备的一种“心智的品质”。米尔斯就此写道：“他们需要的以及他们感到需要的，是一种心智的品质。这种品质可以帮助他们利用信息增进理性，从而使他们能够看清世事，以及或许就发生在他们之间的事情的清晰全貌。我想要描述的正是这种品质，它可能会被记者和学者、艺术家和公众、科学家和编辑们所逐渐期待，可以称之为社会学的想象力。”^③在米尔斯看来，这种“想象力”不仅是对社会中人的经典研究的核心知识支撑，也是一种视角转换的能力。

任何一个学科要永葆其生机和活力，就必须持续不断地发掘其思想理论上的创造力，而拥有对社会运行和发展之动态过程永不间断的思维想象力，

① 康德著，邓晓芒译：《纯粹理性批判》，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01页。

② 康德著，邓晓芒译：《实用人类学》，重庆出版社，1987年版，第49页。

③ C. 赖特·米尔斯著，陈强译：《社会学的想象力》，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3页。

恰是社会学这一学科思想理论创造力永不枯竭的基本保证。从斯宾塞的“社会有机体”到马克思的“社会存在”，从涂尔干的“社会有机关联”到帕累托的“社会剩遗物”，从韦伯的“社会行动”到帕森斯的“社会行动的结构”以及从布迪厄的“社会场域和惯习”到吉登斯的“社会结构化过程”，概莫能外。社会学的想象力恰如一种连接行动与结构及调控行动与结构之矛盾运动的融理性与感性为一体的精神直觉。它使那些伟大的社会学者得以集思想的凝重、深厚、前卫和广阔于一身，并且以辩证思维加兼容思维的“千里眼”，超越历史的羁绊和时代的制约而在思维的运动中特立独行。

超越社会学学科的局限，米尔斯把眼光放到了整个社会科学领域。他说，社会学想象力不为社会学所独有，“社会学想象力正成为文化生活的主要共同尺度和特征，这种心智品质可以在社会科学和心理学中发现，但它远远超出了我们现在所知道的这些研究”，在文学作品，以及政治学、美学、人类学、历史学等社会科学中，甚至在新闻工作者中，都应该具有历史的和结构的视角^①。

二

如果说，“想象力”在米尔斯看来主要表现为一种普遍联系和视角转换的能力，我们就不难发现，传播学从诞生到不同阶段取得的巨大成就，无不贯穿着这种“想象力”的精神和价值取向。

“古老的传播，年轻的传播学”，这是学者们给出的一个十分形象而贴切的说法。事实正是如此，传播学研究起源于20世纪20年代，其概念得以确立则经过了半个多世纪的时间。直到20世纪40年代，这门学科还没有成熟，“虽然有经验——功能主义学派、控制论和结构主义方法论三大基础学派的崛起，在大多数情况下，传播学的理论概念还基本停留在一个线性观念上：一个信息源发出的信息经过一个管道到达接受者”^②。此时的传播研究视角更多地停留在如何增强劝服的效果上。

传播学真正成为一门显学，进入科学研究的殿堂是在1948年。这一

^① C. 赖特·米尔斯著，陈强译：《社会学的想象力》，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13页。

^② 陈卫星著：《传播的观念》，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导言。

年，与传播学肇始密切相关的几部论著先后问世，分别是香农的《通信的数学理论》、维纳的《控制论或关于在动物和机器中控制和通讯的科学》及拉斯韦尔的《社会传播的结构和功能》。作为传播学科“集大成者”的威尔伯·施拉姆同年编辑出版了《大众传播学》，第一次提出了传播学的框架。

现在看来，当时施拉姆的主要工作就是把各类社会科学家讨论传播问题的报告、论文汇集起来。施拉姆看到了传播研究的趋势必然是多学科的交汇，而且看到了，社会科学必然从不同角度观照人类关于自身与媒介的关系。没有这个汇集，传播的知识就永远处于分散和朦胧的状态。毫无疑问，施拉姆是拥有“想象力”的。

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传播学的理论越来越精致和丰富，传播学也由此产生了众多的“模式”和可供遵循的学术规范。即便如此，特立独行的研究者也不断涌现，并不断把传播学研究带入新的领域。加拿大传播学派的奠基人——英尼斯就是杰出的代表。英尼斯极具想象力地把媒介和时间、空间结合起来考察研究。在其著作《传播的偏向》和《帝国与传播》中，他认为，任何传播媒介都具有时间偏向或空间偏向。也就是说，传播媒介或者具有易于长久保存但是却难以运输的倾向性，或者具有易于远距离运送但长久保存性差的倾向性。前者便于对时间跨度的控制，称之为“偏向时间的媒介”；后者便于对空间的控制，称之为“偏向空间的媒介”。重型的材料，如羊皮纸、黏土和石头都属于“偏向时间的媒介”，而轻便的纸草书和纸张都属于“偏向空间的媒介”。根据这样的分类方法，“偏向时间的媒介”控制下的社会，呈现出封闭、信息流通不畅、线形传播、中心主义等特征；而被“偏向空间的媒体”控制的现代社会则呈现为开放、信息量大、多元化传播、去中心等特征。英尼斯从研究加拿大本土的贸易、运输和交通网着手，自成一家，使加拿大的经济学研究走向独立与辉煌，同时，他又奠定了多伦多传播学派的基石，被后人誉为“媒体决定论的开山祖师”^①。他的突出成就，无疑是“想象力”充分发挥的成果。紧随其后的马歇尔·麦克卢汉更是一名“超级想象力大师”，他提出的“媒介即信息”、“冷媒介和热媒介”、“地球村”、“后视镜”

^① 何道宽：《加拿大传播学的双星：英尼斯与麦克卢汉》，载《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2年第5期。

等理论，虽然被人称为“天书”，但是随着网络媒体的出现和普及——得到印证。

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西方传播学研究中出现了五个颇有建树的新兴学派。第一个是传播政治经济学，涉及跨国经济集团的形成、经济和文化领域中的支配现象等问题的研究。第二个学派是语言学，语言行为情境和主观态度介入的研究是其重点。第三个学派是民族志（民俗人类学）传播学和社会互动反应理论，这个学派的研究焦点集中在有民俗内容的社会、移民群体中的特殊传播情境等领域。第四个学派是技术和调解社会学，主要是把新的信息传播技术所带来的社会变化和调解机制结合起来考虑。第五个学派是信息接收理论和媒介消费理论，提出信息接受涉及读者、观众、使用者或消费者，不可能用一种理论或一种研究方法来予以说明。^①

从传播学不同阶段的发展可以看出，传播学的研究及其成果的取得是一个不断应用新型研究方法和不断引入相关学科并拓展研究视角的过程。而这一过程所体现的核心价值，就是充分应用了“想象力”。

三

从诞生到发展，传播学一路走来都有“想象力”做伴。但是，这种情况却没有发生在中国。1978年7月，上海复旦大学新闻系出版了“文化大革命”后的第一家新闻学刊物《外国新闻事业资料》（郑北渭主编）。创刊号上发表了我国第一篇传播学译文《公共传播》，当时将“mass communication”翻译成“公共传播”，而不是后来的“大众传播”，介绍了一些传播学的知识，为了防止被指责为“宣扬资产阶级观点”，郑北渭加了一个按语，批判“公众传播工具”是“垄断资产阶级控制舆论，制造舆论，毒害人民，奴役人民的宣传工具”。就是以这样的“开场白”，传播学在没有“想象力”的伴随下开始了它在中国舞台上的表演。在过去的30年中，我国的传播研究一直是“一个人奔跑”，失去了好伙伴——“想象力”。中国传播学研究“想象力”的缺失集中体现在：

^① 参见陈卫星：《西方当代传播学学术思想的回顾和展望》，载于杨雁斌主编：《流变与走向：当代西方学术》，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44—52页。

（一）“复制复制性想象力”

仔细研究一下我国的传播学的研究，不难发现，属于中国学者独到发现的理论很少。在近年来出版的大量的传播学著作中，译著的比例相当高，而中国学者撰写的专著却相当有限。在译著中，“二三十年前的理论著作居多，时差在10年以上的相当正常，而同步译著较少，而且这些译著的水平参差不齐，有的译著对传播学理论的积累没有什么重大的意义”^①。在中国学者的理论著作中，介绍西方传播学理论的居多，而解决传播学课题的又相对较少，研究的对象通常不是传播学亟须解决的问题，而只是对前人理论的总结和概述。一言以蔽之，就是说明文多，论述文少。正如陈力丹所说：“总体上还停留在引进、介绍的层次，缺乏原创性，发表的文章和申报的课题，内容重复率较高。需要在课题的选择方面加大研究的成分和创新性。”^②一些学者认为，我国的传播学研究就是一个“搬家”的过程，将国外传播学的某个模式或理论简单搬过来，致使对该模式或理论提出的背景和适用范围了解不多，缺乏深入的分析 and 考察。这种“拿来主义”的做法，连最基本的学术研究规范都难以遵循，更遑论“想象力”的展现。

如果说，翻译国外的著作属于“复制性想象力”的话，另外一些研究者的著作就应当称为“复制复制性想象力”了。在中国学者的传播学专著中，总论、概论、通论类的最多。从1988年《传播学原理与应用》问世开始，十几年来，“先后有几十本概论性质的传播学教材和专著问世。若要按比例来算，这种情况在国内人文社会科学各学科中恐怕是最高的”^③。中国的传播学学者或许特别喜欢概括性强的名称，甚至连施拉姆写的书也被译者冠以“传播学概论”之名，其实这本书的原名是《男人、女人、信息与媒介：理解人类传播》^④。

更为奇怪的是，这些教材和专著的框架大多相似，多以拉斯韦尔在《社会传播的结构和功能》中的“五W”模式为框架，对传播者、传播的内容、

① 胡翼青著：《传播学：学科危机与范式革命》，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96页。

② 张国良主编：《中国传播学：反思与前瞻》，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9页。

③ 胡翼青著：《传播学：学科危机与范式革命》，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96页。

④ 李煜主编：《新闻学与传播学：全球化的研究、教育与实践》，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7页。

传媒、受众和传播效果等传播的诸多要素进行一般性的论述。这些概论对于传播学的普及有着积极的意义，而且其中不乏令人耳目一新的独到见解，然而总体上显然缺乏理论的深度和学术的意义，突破性的理论成果非常罕见。“将‘治学’等同于建构学科体系，于是，力图以各种方式阐述‘大众传播学’‘体系’的教科书层出不穷，相比之下，提出并解答具有理论意义的问题的研究却乏善可陈。”^①另外，太多的研究只是就理论来谈理论，至于应该“观照”什么问题，则语焉不详。从中体现出的是中国传播学者的急功近利和“想象力”的匮乏。

（二）“离心力” > “向心力”

“离心力”和“向心力”是每一个学科建构必备的两种力量。每一个传统的和主干的学科，都有一种谋求终极解释的野心，无论其视界展开得多么辽阔，最终还是要回到对于人性的基本设定上来，这就是学科的“向心力”。同时，伴随人类知识视界的展开和学科不断发展，必然导致分支研究的活跃，于是，在知识向心力的相反的方向产生出强大的离心力：每个分支问题的研究，都开发出一门新的学问。学科分化导致新的学科建制和知识资源分配的新格局。

长期以来，传播学一直困惑于自己的学科边界。如果按照“‘人是制造符号——意义系统从事信息传播的动物’的这一设定来建构学科边界，那么传播学简直可以并吞大多数社会科学”^②。事实上这是传播学者过度的自我夸张，体现了该学科内在“向心力”的严重不足。社会科学的分类，基本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学问从基本的人性设定出发，并且通过特定的知识探索，最终丰富对于人性的认知；另一类学问则是从人类的境况出发，描述境况的形成，多角度地探求其根源，寻求改善的途径。无论传播学属于哪一类，都应该具备社会科学的基本特点——研究“人”。从本质上说，传播与“人”是密不可分的。一方面，传播是“人”的生命活动，“人的社会生命起源于与他人的交流”^③、“人的观念的产生与发展源于感觉材料，或者说感觉材料基础上的思想和感情；源于由无数交流活动组成的社会”^④。另一方面，“人”赋予了传播的

① 潘忠党：《传播·文化·社会译丛》总序，华夏出版社，2003年版。

② 吴子敏：《传播学知识论三题》，载《深圳大学学报》（社科版），2001年第6期。

③ 查尔斯·霍顿·库利著，包凡一译：《人类本性与社会秩序》，华夏出版社，1998年版，第6页。

④ 查尔斯·霍顿·库利著，包凡一译：《人类本性与社会秩序》，华夏出版社，1998年版，第75页。

社会意义,“交流的行为是我们称之为社会整体的一个特殊的部分”^①。

传播学要想加大本身的“向心力”,学术研究必须也只能复归到对“人”主体的观照,从人的主体性出发,以追求信息获取、交流与使用最优化,从而满足自身生存发展的根本性需求的“信息人”来作为传播学研究的核心。这要求我们“保持对个人的多样化及时代变迁的宽广视野,把你所看到和所想象的内容,作为你研究人类变迁的线索”^②,重新设定传播研究的逻辑起点,建立传播学的理论大厦。

四

英国 19 世纪的浪漫主义诗人,被誉为拥有“独一无二想象力”的威廉·布莱克曾经说过:“人的想象力是使人类幸福的原动力,然而理性制定出的法律和道德却摧毁想象力。只有人类自己才能把人类从悲苦与困境中解救出来,这就是人类的想象力与艺术创造力。”^③ 布莱克倡导的诗人创造力,是一种人人都具有的内在素质和天赋,是一种富有创造的幻想能力,也就是创造性想象力。

创造性想象力并不神秘,人人都有创造的潜力。孟子早就说过:“人皆可以为尧、舜。”^④ 陶行知更有“人类社会处处是创造之地,天天是创造之时,人人是创造之人”^⑤ 的观点。中国传播学的研究正是缺少这种创造性想象力。

应该到哪里寻找这种“想象力”呢?

布莱克的想象离不开自然界。他认为,“自然物体过去和现在总是削弱、抑制并且淹没我们的想象力,是对灵魂和精神的障碍”。对布莱克来说,物质现象对于人的自由和解放,永远是限制和禁锢的因素,但是障碍可以转化为媒介,这就要凭人的想象的力量,剥去物质的束缚,在充满想象力的人的眼睛里,自然界就是想象力本身。对此,他还进一步阐述:“对于理性占主导地

① 查尔斯·霍顿·库利著,包凡一译:《人类本性与社会秩序》,华夏出版社,1998 年版,第 117 页。

② C. 赖特·米尔斯著,陈强译:《社会学的想象力》,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 年版,第 244 页。

③ 王佐良著:《英国诗史》,译林出版社,1997 年版,第 228 页。

④ 孟子:《孟子·告天下》,《四书五经》(上),岳麓书社出版,1991 年版,第 121 页。

⑤ 陶行知著:《陶行知教育文选》,教育科学出版社,1981 年版,第 326 页。

位的头脑，自然界和想象之间则是感应，是和谐。甚至人的肉体也是想象的形式。整个自然界，从原子到天体，同样可以成为人想象的形式，关键在于想象力能否把握住它。”

历史上，中国人并不缺乏“想象力”。盛唐时期“诗仙”李白是自由、想象力的化身，其文思玄妙，想象纵横驰骋，穿梭古今，豪放不羁，将想象力发挥到极致，“日照香炉生紫烟，遥望瀑布挂前川。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这是何等的气势如虹，想象奇崛。中国古代文论家对于“想象”之于创作实践有着精辟的论述：“迁想妙得”，“精鹜八极，心游万仞”（陆机《文赋》）；“文之思也，其神远矣。故寂然凝虑，思接千载；悄焉动容，视通万里”，“思理为妙，神与物游”（刘勰《文心雕龙》），等等，都将“想象力”作为观照、审视文学创作实践的一个重要链条。

对于“想象力”，《现代汉语词典》是这样解释的：“在知觉材料的基础上，经过新的配合而创造出新形象的能力。”换句话说，“想象力”作为一种能力并不是人与生俱来的，是可以后天培养和训练的。虽然我们缺乏系统成熟的训练程序，“但社会学想象力的培养并不真的玄虚。理论学习就是提高社会学想象力的一条重要途径，除此之外，历史视角是另外一个重要途径”^①。

沿着这种思路，我们或许可以大致描绘出找到传播学研究“想象力”的“路线图”：

第一，历史的视角。和其他研究一样，传播学研究应当充分应用历史观念和占有历史资料，这只是我们要做的第一步。我们在回顾历史的时候，还要随时回到现在，回答“过去何以能够走到现在”这样一个基本的问题。^②

传播学大师麦克卢汉十分善于使用历史视角，并且给这个视角起了一个形象的名字——“后视镜”。麦克卢汉说：“我们透过后视镜看现在。我们倒退步入未来。”^③实际上，对麦克卢汉而言，“后视镜”理论是他研究媒介演化及其影响的基本运作原则，他的许多理论都是在观察比较“后视镜”景象和眼前景象的结论。他发现，刚刚“过去的”旧媒介已经成为新媒介中的内容，

① 卢晖临：《历史视角与社会学想象力》，载于张立升主编《社会学家茶座》第16辑，山东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4页。

② 许正林著：《欧洲传播思想史》，上海三联出版社，2005年版，第9页。

③ 保罗·莱文森著，何道宽译：《数字麦克卢汉——信息化新纪元指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本，第247页。

得出了著名的“媒介即信息”结论；参照过去的村落，分析电子媒介带来的新世界，得出了“地球村”的概念。

我们要巧妙灵活地使用历史视角，处理好“什么时候看后视镜，什么时候看路况”的关系。只看“后视镜”，我们会“迎头撞上没看见的、难以预料的后果”，只看前面的路况，就会“眼睛里看不到、脑子里想不到我们来自何方、曾经去过何方，我们就不可能知道正在向什么地方前进”。^①

第二，质疑的视角。苏格拉底说过，未经审视的人生是没有意义的人生。对于一门学科而言，何尝不是如此。未经审视的学科同样无法证明其存在的理由和价值。北宋唯物主义哲学家张载在《经学理窟》中反复强调“学则须疑”，米尔斯的《社会学的想象力》也是这种质疑精神的产物，贯穿该书始终的是一种批判的建设性视角。这种批判本身就浸润了想象力，它意味着创造性地质疑——质疑权威、质疑传统、质疑约定俗成的观念。萨义德在《知识分子论》中讲道：“知识分子既不是调解者，也不是建立共识者，而是这样一个人：他或她全身投注于批评意识，不愿接受简单的处方、现成的陈腔滥调，或迎合讨好、与人方便地肯定权势者或传统者的说法或做法。不只是被动地不愿意，而是主动地愿意在公众场合这么说。”知识分子的职责就是“时时维持着警觉状态，永远不让似是而非的事物或约定俗成的观念带着走”^②。

质疑不仅需要勇气，更需要想象力。因为人们在使用我们质疑的对象——“权威、传统以及约定俗成的观点”——几乎已经处于一种不假思索的“无意识”状态，质疑这样一种既有的“刻板印象”其难度可想而知。基于此，我们必须确立这样的理念：在传播学发展史上，即使是学术权威的经典理论、观点与方法，也从来都不是无懈可击，更远非“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绝对真理，传统传播研究中的许多“定论”都需要今天的我们运用想象力重新加以审视。譬如，拉斯韦尔著名的“五W”模式对我国的传播学研究产生了巨大影响，以至于在学界形成了5项专门研究。学者林之达就对此产生质疑，认为半个世纪过去了，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传播学研究的拓展与深化，曾经起过积极指导作用的“五W”模式日益显示出它的局限性。该模式给传

① 保罗·莱文森著，何道宽译：《数字麦克卢汉——信息化新纪元指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本，第251页。

② 爱德华·W. 萨义德著，单德兴译：《知识分子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28页。

播学研究者设立了一个讲话的思维定式,致使许多学者一提到传播学的研究内容就总是在这个模式中打转。^①

第三,文化的视角。文化是对一种特定生活方式和生存状态的描绘。这种描绘涉及的不仅仅是某种理论和学问中的价值和意义,其关系到的更是社会制度和日常生活中的某些意义和价值。

在传播学研究中充分发挥文化的想象力,就能够有效地突破传播学囿于信息、效果或者受众等的研究角度,将传播学置于整个人类社会发展和社会生活的坐标中,研究对象也将转变为在具体时空背景和人文环境下的整个传播状态和过程。尤其是在今天,信息时代中充斥了各种新兴媒介,而对于这些层出不穷的新媒体,“如果仅仅限于其工具性的研究,满足于对传播现象做一些细枝末节的描述和分析,将无法真正进入传播现象的本质,更难解释传播如何作为一种社会行为和文化的整合存在的原因”^②。

可以说,传播学研究中离不开文化观念和文化的视野。语义学、符号学、解释学、福柯的文化史学方法、历史学和社会学等都是传播学研究的理论资源和基础。多学科的联系和相互转换无疑会给我们带来新的视野和巨大的想象空间。

第四,以“人”为中心。比照其他人文社会科学学科,我们不难发现,这些学科都是围绕各自的人性假说来建构其理论框架展开研究的。社会学讨论人类的群体生活状态,关注的焦点是“社会人”;经济学以“经济人”为其人性假设;政治学则以“人是政治的动物”为理论假设前提。那么,传播学呢?传播学从诞生至今始终没有建构起以相关“人性假说”为逻辑起点的理论体系,据说是因为它是跨学科的产物,关涉的理论太过庞杂之故。

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从本质上说,传播与“人”不可分割。但是,一直以来,“对传播过程的研究”却被设定为传播研究当然的“母题”,而作为传播过程中的主体——“人”——却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这实质是一种本末倒置的做法。在我国,传统传播学研究过于偏向大众传播领域的研究,传播学被置换成了大众传播学,研究领域明显被“窄化”。就研究对象而

^① 林之达:《传播学的一些基本问题》,载于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编:《传播·社会·发展:全国第四次传播学研讨会论文集》,成都科技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09页。

^② 杨星星:《“想象力”和传播学研究》,载于郭建斌主编:《文化适应与传播》,云南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17页。

言,“社会科学应当关注的是人类的多样性。这种多样性构成了人类过去、现在和未来分别生活于其中的全部社会世界”^①。显然,这种多样性同样是传播研究的应有之义。

传播学研究必须也只能复归到对“人”主体的观照,从人的主体性出发,切实关注人的传播动机,研究人与传播的关系,人的思维和行为对传播的决定性作用,传播媒介对人类社会的价值、意义等关涉人类存在与发展的根本性的传播问题。

五

拥有“想象力”是种能力,寻找“想象力”是种态度。笔者自知并不拥有这种能力,但是我们寻找“想象力”的态度将会一直贯穿全书。我们将会抱着这种态度来观察和审视网络与少数民族文化。

网络的出现,会给少数民族文化带来冲击和变化,这个结论似乎很少有人产生怀疑。但是在回答网络是通过何种方式和渠道改变少数民族文化这个问题时,我们却没有找到一个明确的、已知的答案,因为“从技术到文化的方程式太复杂”^②。对于这个复杂的方程式,本书只能用自己的“想象力”来寻找答案。

网络就如“龙卷风”,可以席卷社会生活的一切内容。历史证明,每一种新媒介的出现都会带来新的社会变革。但新媒介对社会文化的作用并不是直接表现出来的,而是具体落实在某种传播方式上,“传播不能直接产生社会效益,它必须首先作用于人,以人为中介才能转化、显示出它的社会功能”^③。每一种新的传播方式总是“潜入”社会,在一定时间内与某种旧的传播方式并存,通过改变社会环境、人的存在状态和存在方式,对社会文化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麦克卢汉曾经说,“技术的影响并不是产生于意见和观念的层次,而是体现在它悄悄地毫无抗拒地改变感觉比例和知觉形式”^④。这种方式

① C. 赖特·米尔斯著,陈强译:《社会学的想象力》,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142页。

② 保罗·莱文森著,何道宽译:《莱文森精粹》,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3页。

③ 袁军主编:《传播学在中国》,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1999年版,第31页。

④ 张咏华著:《媒介分析:传播技术神话的解读》,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62页。